

幸福、经济与政治： 走向多学科方法

[美]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Amitava Krishna Dutt)

编

[美]本杰明·拉德克里夫 (Benjamin Radcliff)

叶娟丽 韩瑞波 等译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复旦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幸福、经济与政治： 走向多学科方法

[美]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Amitava Krishna Dutt）

[美]本杰明·拉德克里夫（Benjamin Radcliff）

编

叶娟丽 韩瑞波 等译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经济与政治:走向多学科方法/[美]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Amitava Krishna Dutt), [美]本杰明·拉德克里夫(Benjamin Radcliff)编;
叶娟丽、韩瑞波等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1
书名原文: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ISBN 978-7-309-12957-1

I. 幸… II. ①阿…②本…③叶… III. 幸福-通俗读物 IV. 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559 号

HAPPINES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by

AMITAVA KRISHN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Copyright © 2009 BY AMITAVA KRISHNA DUTT AND BENJAMIN RADCLIF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E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2-827 号

幸福、经济与政治:走向多学科方法

[美]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Amitava Krishna Dutt) 编

[美]本杰明·拉德克里夫(Benjamin Radcliff)

叶娟丽 韩瑞波 等译

责任编辑/孙程姣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384 千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957-1/B·604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名录 | Contributors

马修·彻丽(Matthew Cherry),爱荷华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爱荷华州爱荷华市。

苏珊·M·科肖(Suzanne M. Coshow),印第安纳大学南弯(South Bend)分校心理学系,美国印第安纳州南弯市。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Amitava Krishna Dutt),圣母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系,美国印第安纳州。

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安德鲁·费尔顿(Andrew Felton),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美国华盛顿特区。

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研究院,美国纽约州伊萨卡(Ithaca)。

布鲁诺·S·弗雷(Bruno S. Frey),苏黎世大学经济学系,瑞士。

亚瑟·戈德史密斯(Arthur Goldsmith),华盛顿-李大学(Washington, DC and Lee University)经济学系,美国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Lexington)。

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布鲁金斯学院,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园区(College Park)。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Ann Arbor)。

索尼娅·柳博米尔斯基(Sonja Lyubomirsky),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Riverside)分校心理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达林·M·麦克马洪(Darrin M. McMahon),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系,美国佛罗里达州

塔拉哈西(Tallahassee)。

安东尼·D·王(Anthony D. Ong),康奈尔大学人类发展系,美国纽约州伊萨卡。

亚历山大·C·佩斯克(Alexander C. Pacek),德克萨斯 A&M 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德克萨斯州。

本杰明·拉德克里夫(Benjamin Radcliff),圣母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印第安纳州。

汤姆·赖斯(Tom Rice),爱荷华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爱荷华州爱荷华市。

夏洛特·里奇(Charlotte Ridge),爱荷华大学政治科学系,美国爱荷华州爱荷华市。

欧尼查·撒旺法(Onnicha Sawangfa),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肯农·M·谢尔顿(Kennon M. Sheldon),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

阿洛伊斯·史图策(Alois Stutzer),巴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Basel)商业与经济学系,瑞士巴塞尔。

鲁特·范荷文(Ruut Veenhoven),伊拉斯谟大学(Erasmus University)心理学系,荷兰鹿特丹。

前言

Preface

本书源于2006年10月22~24日在圣母大学召开的“幸福研究的新方向：美国与国际的视角”(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Happiness: US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研讨会。本书大多数章节的初稿是在那次研讨会上提交的。感谢那次研讨会的参加者,尤其是本书的作者们,感谢他们的赐稿、耐心与鼓励。我们同时向圣母大学的经济与政策研究系、艺术与文学学院、美国民主项目组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慷慨的资金与后勤方面的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哈丽特·鲍德温(Harriet Baldwin)帮助组织了这次研讨会。我们也非常感谢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出版公司工作人员的帮助,尤其是乔安妮·贝特里奇(Joanne Betteridge)和凯特·皮尔斯(Kate Pearce)。

那次研讨会因其多学科特性(而且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与参与),尤其令人兴奋与愉快。我们非常高兴将其结集出版以利更广泛地传播。这种传播将事半功倍,正如我们在导言中所阐明的,因为我们相信,单篇文章集合起来,其效力强于本书中任何一部分,正如各个部分已经做到的那样,它们很好地概述了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的新兴领域的现状。我们期待本书的出版也将是令人兴奋与愉快的,我们敢说,它必将增进更广大读者的幸福。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本杰明·拉德克里夫

目 录 | Contents

导 言 幸福、经济与政治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本杰明·拉德克里夫 / 1

第一篇 幸 福

第 1 章 幸福史与当代幸福研究 达林·M·麦克马洪 / 17

第 2 章 幸福的测量与误测：当代理论与方法论导向 安东尼·D·王 / 24

第 3 章 如何判断我们有多幸福？三种理论的原则、含义及可持续性
鲁特·范荷文 / 33

第 4 章 幸福和域满意度：幸福经济学的新方向 理查德·A·伊斯特林 欧尼查·撒旺
法 / 54

第二篇 幸福与经济

第 5 章 当诱惑压倒意志力时的幸福 阿洛伊斯·史图策 / 79

第 6 章 幸福与相对消费假设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 104

第 7 章 伊斯特林悖论再探 罗伯特·H·弗兰克 / 122

第 8 章 不平等对个人福利重要吗？
——基于拉美幸福调查的初探 卡罗尔·格雷厄姆 安德鲁·费尔顿 / 128

第 9 章 歧视感知、获得心理平衡的努力与相对工资：我们能推断出幸福梯度吗？
亚瑟·戈德史密斯 / 164

第三篇 幸福与政治

第 10 章 政治与幸福：实证研究分类述评(empirical ledger)

亚历山大·C·佩斯克 / 189

第 11 章 民主与幸福：什么影响什么？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 208

第 12 章 幸福与民主福利制度的因果联系 夏洛特·里奇 汤姆·赖斯 马修·彻丽 /
220

第 13 章 美国各州的劳工组织与生活质量 苏珊·M·科肖 本杰明·拉德克里夫 /
231

第四篇 该做些什么

第 14 章 国民幸福该最大化吗？ 布鲁诺·弗雷 阿洛伊斯·史图策 / 245

第 15 章 改变你的行为而非环境：可持续幸福模型的实证检验 肯农·谢尔顿 索尼
娅·柳博米尔斯基 / 264

第 16 章 该做些什么？走向“幸福”世界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本杰明·雷德克
里夫 / 280

译后记 / 286

幸福、经济与政治

阿米塔瓦·克里希纳·杜特 本杰明·拉德克里夫

关于幸福的特性和意义在过去几个世纪已被宗教人士和哲学家深入讨论过了,近年来又得到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另外,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是,幸福往往是(或至少是)大多数人的目标或者动力。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叫作“幸福科学”的新研究领域。这一领域试图用定量的或可测量的概念来检视幸福感,用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的实验和理论工具来分析幸福的决定因素。

然而,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以极其不同的方法来完成的。心理学家从强调抑郁问题,转向思考积极情感,并试图用调查与经验数据乃至大脑信号来测量大量的幸福概念,其研究聚焦于各种心理过程、人格特征和环境因素,以理解幸福的决定因素。经济学家们专注于收入与消费对幸福和福祉(well-being)的影响,争论金钱究竟能否买到幸福。他们用经济增长与福祉改善的概念来研究经济发展。社会学家强调社区、家庭和组织内的相互作用乃至更广泛的文化对幸福的影响。政治科学家强调研究不同的政府制度——如民主——和不同的政府政策类型——如福利国家的规模——如何影响幸福。哲学家在思考幸福的含义——比如,是否关涉快乐的最大化,痛苦的最小化,或者快乐与痛苦差别的最小化,或者是否关涉人类繁荣。当然,也有学者跨越了自己学科的规范边界,将多种因素合并。比如,有些经济学家——像凡勃伦(Veblen, 1899),最近的如肖尔(Schor, 1998)和弗兰克(Frank, 1999)——将传统社会学家所研究的身份理论用来分析消费与幸福的关系,而一些政治科学家——如莱恩(Lane, 2000)和帕特南(Putnam, 2000)——将与友谊和共同体相关的问题的讨论用作理解幸福的决定因素。当然,大致趋势仍然是在学术界既定的学科结构下,大部分讨论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范围之内。

对于研究幸福与福祉的学生,我们相信幸福的研究最好从多学科视角出发,而且我们相信,要想在某一个学科取得进展,我们需要在不同学科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因此,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多学科,包括历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等学者参加的研讨会,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的概念与问题如何结合与交叉发展。因此,尽管我们寻求不同学科的广泛代表性,我们邀请的经济学与政治科学学科的学者仍然要

更多一些。

本书包含了研讨会上提交的大多数论文,以及基于我们自己工作的反思和研讨会的后续进展。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幸福概论;第二部分关于经济与幸福;第三部分关于政治与幸福;最后一部分涉及该做什么。本导言接下来的内容将讨论与每一部分有关的某些核心问题,以及本书的每一章关于这些核心问题是如何组织的。因此,导言后面的部分涉及关于幸福的历史、概念化、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般介绍。依次地,后面的两部分将分别考察幸福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接下来的部分将证明跨学科视角对更好地理解幸福及其决定因素的必要性,我们将集中讨论在解释幸福问题时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最后一部分我们将会讨论,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分析为了增进人类福祉和使人们更幸福我们能够以及应该做些什么的意义。

一、幸福

像大多数真正伟大的理念一样,幸福成功地抵制了将其简化为某个单一含义或者定义的企图。因此,我们一开始就不仅仅像哲学家那样从评价幸福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想象幸福来开始我们的讨论,而是也像经验主义学者那样来观察世界。因此,本书从达林·M·麦克马洪关于西方社会对待幸福的意义、如何认识达致幸福的可能性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开始,其中他花了很大篇幅讨论幸福的历史(McMahon, 2006)。早期,幸福被看作运气问题,或者不易即时获取的东西,至少较多人这样想。麦克马洪认为,幸福是我们人类终极目标的概念,是一个成功地取代了其他理解世界与人类自身目标的思维方法的启蒙主义信条,他将这一启蒙主义信条的胜利看作解释当代广泛的研究幸福诉求的动力。但他也提到,认识幸福理念的这一历史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幸福。因此,麦克马洪“以一个谦卑的历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学者的姿态恳求我们在着手研究时要持有某种程度的谦卑,同时指出对待幸福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态度会阻挠人们获得他们努力去追求的东西”。

在所有关于幸福含义的研究中,都可以轻易地看到谦卑的必要性。我们在东西方最早的哲学家和宗教中都可看到对幸福的关注。比如,古老的印度信仰体系,现在统称为印度教(Hinduism),认为“真正的”幸福就是通过婆罗门(Brahman)、普世灵魂、世俗欲望的解脱来实现人的同一性(Oneness)。佛教也强调克制欲望、避免极乐和苦行以及走中庸之道的重要性。那些重要的希腊哲学家并不特别强调日常的感官快乐,如柏拉图主张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奴役,亚里士多德强调从事那些引致幸福感(eudaimonia)或人类繁荣的活动,如最高水平的智者深思。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将幸福是通过理解与服务上帝而达致宗教生活和信仰的目标。然而,他们主张,只有与上帝结合,才能在来世获得真正的幸福。后世的基督教哲学家,像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关于现世的幸福观与早期基督徒认为幸福只存在于来世的观点,主张现世的幸福尽管不完美,但通过有德行的生活可以接近来世真正的幸福。

随着宗教对日常生活控制的减弱,以及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世俗化,幸福是地球上所有人都会渴望的某种东西的观点逐渐被接受。然而,哲学家们给幸福附加了很多含义。如功利主义者强调增进幸福即意味着我们应认真对待那些看似平凡的事情,应当增进快乐减少痛苦。其他人,如叔本华,与东方传统观念相类似,主要强调减少痛苦。还有些人,如尼采以及天才作家乔伊斯(Joyce),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追求快乐的最大化和“充满激情的快乐(passionate joy)”。

与试图通过这些方式定义幸福不同,有些社会科学家更倾向询问人们实际上到底感到有多幸福。现在有大量的这类调查数据可资利用,如通过10分制问卷询问人们对其生活感到有多幸福或者满足,这些提问涉及所有方面。这种方法事实上允许主体定义什么是幸福,并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来决定他们到底有多幸福。这种幸福研究方法通常涉及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它致力于应用更加精确且较少感情负荷的术语而不是幸福本身。有些人认为这种测量是有效且可信的,因为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以及它们随时间地点的变化方式可以告诉我们那些使人们福利改善的客观条件。其他一些人则对此存疑,因为人们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且人们是会随环境而改变的。因此,不同的文化对幸福有不同的阐释和诉求,而且,穷人可能会习惯他们的处境,并感到相当幸福。

除了日益流行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外,社会科学家继续采用较少主观性的方法测量幸福与福祉。因此,心理学家区分了幸福的不同水平,首先考察了(短暂的)情感与喜悦、快乐的感受,其次考察基于较长时段内人们对其感受的评价(即主观幸福感),最后考察一个人是否真正实现了其潜在的要求或者只是夸耀(flourishes)他们的理念更接近古希腊语境中的良好生活或者幸福感(参见 Nettles, 2005)。在本书中,安东尼·D·王提出,关于幸福与福祉的心理学的创新发展主张,福祉不能仅由一个维度表示,因此研究者们必须考察幸福与福祉的实现论(eudaimonic)与享乐论(hedonic)两个方面,以获得对积极的人类健康的更加全面的理解。王指出,现行的心理学研究对福利的测量有两种可选的途径。一是测量主观幸福感,这涉及一个人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这是情感的方面,包含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组成部分。二是源于德行的幸福感表达,它追求实现一个人真正的潜能,由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WB)概念来测量,涉及人类现实化的不同方面,如自主、个性发展、生活意义和社会联系。王还提出,使用这种方法,有可能考察福祉这两方面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变化(现行的绝大多数研究仅从一个方面考察人们之间的不同)。他考察了与纵向面板设计(longitudinal panel designs)和密阵设计(intensive bursts designs)有关的方法,以及用途并不广泛的增长曲线模型(growth curve modeling)和使用微分方程的动态系统分析(dynamic systems analysis),并讨论了这些方法是如何处理理解人类大脑复杂性所必需的圆形或者不规则结构(而不是线性系统)的。麦克马洪等在本书中警示我们,人们很轻易地接受了以调查为基础的关于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指标的常规和主流的研究方法。本书其他章节,作为文献规范的反映,相对更加倚重对福祉的直接测量。

然而,由于经济主体以个体效用(可通过主观幸福感调查来测量)的名义来解释行为与

评估状态,那些热衷于效用概念从而使之最大化的经济学家,通常更加倚重通过国民经济核算所测量到的真实的收入与生产,因其假定“多”(指产品与收入)即“好”(指效用或幸福),从而测量相对容易。另外,考虑到从主观感受(如穷人适应了其贫困处境)的角度人们会适应其现状,有些经济学家(特别参见 Sen, 1999)较少使用主观概念如功效[(functionings),不管人们是否能够在物的方面得到特定的好处——如良好的身体、充足的营养甚至足够的尊重——都认为是值得的]或者能力(不管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功效,也不管人们事实上是否已经获得了这些)。

从关于幸福的含义到幸福理论,在社会科学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中,有三种理论用以预测国与国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幸福是如何变化的。根据范荷文和伊尔哈特(Veenhoven and Ehrhardt, 1999)提出、后由鲁特·范荷文在本书进一步阐发的术语,人们能够想得到的理论集中于:(1) 特质(traits);(2) 社会比较;(3) 需求满意度。

特质论主张幸福是一种相对复杂的个性特质,与个性的其他方面相似,是遗传、文化社会化和其他早年生活经历相结合的产物。个体倾向处于幸福的某种基本水平,同样,也倾向拥有某种程度的外向或者乐观。因此,心理学家通常将个体的倾向称为“设定点(set-points)”。生活中的变故可能会导致他们感受更多或者更少的幸福,但这种变化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将最终接近最初的设定点。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国家层面。这就意味着,作为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有些国家的人民只是自然地趋向于比另一些国家的人幸福些。那是民族的设定点,反映了某种民族性格。

像伊斯特林(Easterlin, 1974)这样的经济学家,偏向于比较理论。比较理论的前提是个体倾向从相对的角度而非绝对的角度来评估他们生活的质量。简单地说,人们期待社会的“消费规范(consumption norm)”,根据这一规范来评估自己的生活,消费水平高的认为自己满足感更强,而那些消费水平低的则更少得到满足。其结论显而易见,假设消费规范是社会中位数,各地的平均幸福水平就趋向一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有明显变化(当然,提高消费的社会中位数水平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中位数以下的人们与其上的人们总是一样多)。还有很多复杂且先进的相对概念(如 Diener, et al., 1999),但所有概念都建基于比较人的身份(典型的如收入、社会地位或其他消费测量)与某些外部标准的基本概念之上。

特质与比较理论,都与范荷文标榜的“常识(common sense)”论针锋相对。“常识”论主张,生活的满意度是由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允许其满足的需求总量决定的。因此,按照常规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 1954),得到满足的需求越多,就越容易发现生活是有回报感与成就感的。本书中范荷文提供的论文继续其对特质与比较理论的评价,宣扬与捍卫其需求理论。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觉得最引人注目的特质与比较理论,其风险是巨大的,这一理论的结论倾向简单化,即认为国家层面的幸福无法持久地得到改善,因为如果幸福是一种特质,不管我们世人所做的干预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安全或者令人愉快,幸福水平都会回到其设定点;而且,如果幸福是相对的,这些相同的改进措施也仅仅会提升消费型态,而整个幸福水平并未改变。总之,如果假定特质与比较理论都认为这样做不会提高世界上实际幸福的总量,那

么我们在理论上如何定义幸福,就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试图改进生活条件的努力是否理智。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将其应用于纯粹个人水平[乃至聚集体(aggregate)]时,幸福的设定点概念不必去迎合范荷文的结论。因此,可以假定,人们都有设定点,也许是作为个性的一个硬性的遗传方面;同时也得承认,个体可能会为了更大的幸福,通过自己的自主权而反抗这种设定点的继承,从而改编自己(即适应)。这对于像范荷文一样关注利用公共政策来改善客观生活条件乃至主观生活评价(假定一个国家由其文化形态所体现的“国民性格”几乎不可能被改编)的研究者,可能难以令人满意,但它为那些需要利用特殊方法使其日常生活变得满意的个体打开了一扇门。正是这种可能性导致了“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出现。肯农·谢尔顿和索尼娅·柳博米爾斯基向本书提交的论文以“可持续幸福模型”的形式概述了本领域最有发展前景的成就之一。他们认为,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掌控的遗传学以及环境因素决定的。当然,他们也承认,个人的行为在其中也起到一定作用,因此设定点应该被解释为“一个范围”,这样人们才能处于自己设定范围的较高水平来构建自己的生活,并且总能发现自己的幸福远远高于单纯由遗传决定的水平。

比较理论的拥护者也不赞成幸福不能随时空改变的观点。即使像收入与消费水平这类事情,人们的幸福感也主要来自与他人的比较而不是他们收入与消费的绝对水平。当然,也不能因此说,个体幸福感依赖的所有事情都涉及此类比较。比如说,个体的幸福水平可能与休闲的绝对水平、与家人以及朋友共度的时间、良好的身体状况、洁净的环境等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事实上,正如后面我们所要讨论的那样,他们认为个体事实上更加专注于从比较中获得幸福(即要比别人强),而与比较无关的事情他们较少关注。

与我们关注的幸福研究相关的最后一个理论分歧,即关于全球生活的一般性评价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或者“域”的幸福评价之间的分歧。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前者。而关于幸福的后一种解释,可以被界定为个人通过与家人共同生活、拥有良好的身体、有工作薪酬或者更多的钱而获得的一种感受。这一观点同时建议对现实条件如何决定总体幸福进行经验研究。已有大量文献考察幸福的决定因素,特别是考察幸福如何依赖于一些个性化的因素,如收入、身体状况、是否就业、工作条件、与家人或朋友共度的时间、地位、宗教信仰、个性特征、年龄、婚姻关系、性别、种族,还有大的经济环境如通胀、失业率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大的政治环境如政府特征、对政府的信任度、政治不稳定,还有像气候等综合因素(参见 Argyle, 1987, 1999; Frey and Stutzer, 2002; Layard, 2005)。在理查德·A·伊斯特林和欧尼查·撒旺法提交的论文中,他们将这两类文献结合起来,考察了总的幸福指数趋势与建基于广泛讨论的诸如财政、家庭生活、工作和健康等领域的人们的满意度报告具有何种关联。他们发现,某个特定领域的重要性取决于与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受教育年限来测量)、时间(年龄虚拟变量)、年龄或出生队列(birth cohort)等相关的现实生活条件,而且没有哪一个领域总是总体幸福的关键决定因素。这一分析促使他们去解释关于美国的幸福数据中的大量实证趋势,即幸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正向截面关系(positive cross-sectional relation)、幸

福的横向时间序列趋势、生命周期幸福的丘状图(hill pattern)以及代际幸福感的衰退。

二、幸福与经济

经济学家显著关切的问题是当人们消费的物品与服务越多时其幸福感是否会提升。人们总是普遍认为,“多”就是“好”,金钱能够买来幸福。这一信念反映在相信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中,他们认为效用会随着个人消费或者收入而无限地增长(尽管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这一信念也表现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使用效率来评价经济形势。尽管效率正式的界定应当为这样一种状况,即无其他人境况变坏就不能使任何人境况变好,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常常要求与生产效率相联系,即在不减少其他方面生产的情况下,经济境况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物品或者服务——任何事情都存在机会成本。经济学家总是将经济发展等同于人均收入或者生产力的增长,即使他们考虑公平或分配问题时,他们也总是用实际收入或者消费来评价不公平或者贫困现象。

但是,得到更多的人真的就更幸福吗?从伊斯特林(1973)独创性的贡献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发现,那种主观感受的幸福并不随收入而系统地增长(参见 Easterlin, 2001; Frey and Stutzer, 2002; Layard, 2005)。多数跨国研究发现,在超过了某一收入水平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随收入而明显增长。关于富裕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尽管收入有明显增长,但幸福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富裕国家那些随时间的推移而经历了收入增长的个人,报告中并未发现有明显的幸福感的增长。经验分析明确地支持越多越好这一观念的,仅存在于个别国家的截面分析中:拥有高收入的人比穷人更容易感到幸福。

用什么来解释这些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的经验研究结论?所谓正确的答案,必须解释人们为什么要提高收入与消费水平以及他们为什么又并没有因此而更幸福,即一种被称作“伊斯特林悖论”的现象。经济学家似乎提出了很多有道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专注于个人决策,认为很多因素导致个人制定了使自己贫困的决策,这些决策使他们在消费更多的同时并未带来更多幸福。另一类专注于个人决策的社会环境,认为尽管人们可以孤立地制定使其更幸福的决策,但其决策还是会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而这所有个人的行为结合起来,就可能导致个人并不更幸福的情况出现。

第一类解释集中于决策的心理过程以及人们决策后的情感历程。人们决定做某些事,如更多地消费,但这一决策并没使其更幸福,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什么能使自己幸福,或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做某事而使自己更幸福的意志力。阿洛伊斯·史图策为本书提交的论文利用幸福研究工具考察个体是否基于自利而“理性地”行动,或者他们有时是否会被诱惑控制了意志力,导致结果对于他们而言并非最理想。他通过评述关于吸烟与电视依赖的分析与数据来考察这一问题,讨论了他最近关于肥胖的研究。他发现,有些个人经常被报告因其关于吸烟、电视依赖、贪吃的决定及其后果而不幸福。而这种幸福感的缺失显然与其自我判断的没有自制力有关。因此,当做某事能够导致立刻的(即使是少量的)满足,即使代价会随之而

来(即使这种代价很好理解且显著),人们还是会做这件事。这些发现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假设——因为人们会“理性”选择,所以人们总是会选择做对自己最有利的的事情——相违背。

第二类解释则指出,因为人们的决策以及决策后的情感经历会受他人的影响,当人们相互影响时,人们会作出并不会使自己更幸福的决策。比如,在维布伦(Veblen, 1899)、肖尔(Schor, 1998)和弗兰克(Frank, 1999)的相关研究之后,很多其他研究者也认为,个体试图通过更多消费来提高其社会地位,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其结果是谁也不会更幸福,事实上他们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因为他们更多消费的念头导致其将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面,牺牲了休闲以及与家人朋友共处的时间,而且可能产生债务从而导致财务危机。长时间的高消费还可能导致人们欲望水平的提高以及关于需求的社会习俗变化,因此也就不会有幸福感的提升(参见 Easterlin, 2001)。此外,由于提高了促销成本,公司可能会诱惑消费者购买那些最终会提高他们期望值的商品,而使之并不更幸福。在范荷文后,这种解释较早人在比较理论中被提及。然而,这一研究结论也并非意味着幸福或者福祉不会依赖于某些外在环境。有几种类型的研究与相对消费假设密切相关。这一假设认为,所有人提高消费水平的努力对幸福感并无明显的改变,因为其相对消费水平并未发生改变。

阿米塔瓦·杜特所负责的章节,评述了几种关于人们在幸福感并未提升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提高消费的不同解释。他认为,相对消费效应非常普遍,尤其是那些通过提升社会地位的消费和基准(norm-based)消费。这章也讨论了关于相对消费假设的一个简单的理论公式,考察了其含义,如宗教信仰在提升幸福感中的作用,证明其与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一分析意味着,在某个特定的点后,更多并非意味着更好。

可以说,在解释了为何消费水平提高而幸福感并未提升之外,这两类解释对于主流经济学或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都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意义。第一类解释质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公理,即经济行为者都是“理性的”最优化者。第二类解释质疑了整个效用观念,即越多(物品或者服务)就是越好的观念。

除了对金钱能否买来个人的幸福感兴趣之外,经济学家也关心幸福或者福祉是如何依赖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的,如失业、通胀、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等。这些关系不仅仅对他们自己理解何种环境条件有利于生活改善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影响收入与消费这些方面与幸福、福祉之间的关系。比如,很多个人的高消费会破坏环境,而这反过来会对幸福感有负面影响。同时,人们努力提高消费水平的努力,会倾向支持那类损害工人权益的政策,那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从而反过来损害幸福感。较高的消费水平还有可能刺激总体的需求,扩大生产,减少失业,从而导致人们更幸福。

本书还有两章考察幸福和福祉与类似总体的生活环境的关系。罗伯特·弗兰克根据伊斯特林悖论关于收入增长(至少超过某个点后)并不带来幸福增长的理论,考察了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他首先指出,收入与幸福的关系是有争议的,正如最近史蒂文森和沃尔弗斯(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和伊斯特林所讨论的那样。但关于收入与幸福关

系的争论并没有回答人们为何渴望经济增长的问题。当然,根据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幸福和其他一些东西,如自主权、良好的身体状况以及安全的居住环境等,都是好东西。弗兰克认为经济增长事实上能够造福人类,因为它能够减少婴儿死亡与饥饿,以及为包括环境改善、减少对少数群体歧视和制定帮助穷人的政策等方面的政治和社会进步创造前提。自然进化选择有利于具有更高生存能力从而也能更适应环境的有机体,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更幸福的人。因此,人们有可能适应好的经济环境或者坏的经济环境,但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一件好事。

卡罗尔·格雷厄姆和安德鲁·费尔顿的论文简单地回顾了关于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经验文献,进而对关于拉美国家调查的大量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一些早期的研究(包括 Alesina et al., 2004)认为,在美国和欧洲,不平等对幸福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认同这一点。格雷厄姆和费尔顿认为,不平等对拉美国家幸福感的影响,取决于其所使用的不平等的概念(即一个国家总体的不平等,不同群体间的相对收入或财富,个人可感知的地位,关于社会总体不平等和对社会流动性的认知)。他们的研究表明了相对收入和财富对幸福感有积极的明显的影响,支持了相对消费假设。这意味着,随着不平等的增强,穷人会变得更加不幸福,而富人则变得更幸福。他们同时发现,关于不平等的认知、地位和机会,至少与相对收入或财富一样重要;不平等而非未来的机会,被认为是拉美国家富人永远处于优势而穷人永远处于劣势的一个标签。

导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机制就是歧视。亚瑟·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论文中通过考察因种族而产生的薪酬歧视问题,研究了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这一后果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相同背景及特点的黑人工人的薪酬要低于白人工人;同时,他们的研究还基于这样一个观念:相对收入是幸福和福祉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根据对歧视认知的调查数据,他们考察了那些感到被歧视的工人对此的反应:要么等着老板发现他们的能力,要么停止努力,要么更加努力。他们既通过考察那些意识到被歧视的黑人工人对薪酬差别的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也考察那些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来研究歧视对幸福的影响。他们发现调查数据与假设是一致的,这个假设就是:刚雇佣时即感知被歧视的黑人工人,倾向通过努力来克服这一问题;而已身在工厂或者因升迁而被歧视过的黑人工人,则倾向不再努力。

三、幸福与政治

政治科学家是幸福及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的后来者。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起政治学的关注,尤其是将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引进幸福研究领域。

基于此,亚历山大·佩斯克的论文对现有的关于广义的政治因素对公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进行了一个总的概括。佩斯克提供了一个近似于百科全书式的回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相关研究做了一个列举以及批判性的评价。正如他详细地讨论到的,政治要

求的核心领域,包括民主的地位、社会资本(和促进或阻碍社会资本的政府体制)、劳工组织作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促进广泛的工薪阶层利益的利益集团的地位、福利国家的规模和性质特征(以及社会民主、习惯性地被当作支持政府努力地维持收入或再分配的代理人的劳工和其他进步政党),乃至税收以及政府的支出政策。

其中三个主题在本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讨论的无疑是最基础且引人入胜的问题,那就是政治科学家可能会质疑幸福感,即民主进程的制度化以及与之相随的公民与政治的自由民主,就意味着幸福吗?也许非政治学领域的人会觉得奇怪,这个问题并无我们期待中的答案。首先,有很好的理由质疑通常被作为社会问题万灵药的民主是否真的能够达成我们已经为之付出过努力的那些希望。可以肯定的是,民主因其反专制与剥削,在本质上是好的,但民主并不会自动地回报人们以好的生活。因此罗伯特·雷恩(Robert Lane, 2000)认为,无论从表面上,还是心理层面,民主都会增加公民生活的成本。简单地说,雷恩认为,民主可能引发类似于存在主义者所提出的现代生活中人们的焦虑和困惑:个体通过其代理机构来分享责任,同时也因面对无法掌控的集体行动结果而深感无力。也存在一种可能,即公民通过投票(ballot box)集体选择了导致贫困的政策,使得通过市场或者技术官僚选择更好的政策政治化了,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有害的结果。讨论的另一进路即英格尔哈特著作的焦点,即将民主与更大的福祉相联系的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英格尔哈特问题的本质是:民主能提升满足感吗?或者,成功运转的民主进程是公民满意的一个必要条件吗?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幸福研究中所有与政治经济问题相关的其他政治因素,也出现在“普通嫌犯(usual suspects)”列表中。获得最多关注的就是本杰明·拉德克里夫的争议性著作(Radcliff, 2001)。他认为,广泛的福利制度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评价紧密相关。现有的最主要的讨论是一个持续已久的问题,即政治科学家已经接受的一个俚语“市场反对政治”。关于政治经济的讨论有两个主要的流派:人类福祉是主要交由自我调节的市场,通过最精简的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网”,政府对总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提供最低程度的调节;还是如拉德克里夫(Radcliff, 2001)提出的那样,通过更多的管制和对收入强有力的维护所组成的联合机制,从市场中“解放”出来?总体上,争论变成了政府所追求的一个公共政策体制问题,随着现代工业经济的到来,主要的选择也就只剩下“左”或“右”两种传统方案了。

佩斯克提交的论文根据拉德克里夫与其他人的争论,相当详尽地评述了其“左”倾方案的大量证据,实证地看,其倾向于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提供最可靠的路径(surest path)。夏洛特·里奇、汤姆·赖斯和马修·彻丽的论文则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社会民主政策管理体制与幸福之间的显性统计学关系可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健。他们认为,在某种利害关系条件下,对拉德克里夫提供的分类应持必要的怀疑主义的态度。他们写道:“[拉德克里夫]不仅认为在某类政府条件下人们更幸福,他还宣称,幸福或许是对好社会的最有意义的评判。”